

《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回顧（1911-2006）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Ku Chin Tu Shu Chi Cheng* (1911-2006)

詹惠媛（Chan Hui-yuan）*

在中國圖書文獻體制發展之碩流中，類書以其「縷析條分」、「靡所不載」之鮮明個性匯聚為一澎湃支流，此一支流自有其紛繁淵源與生成契機，就學者之共識乃以曹魏時期《皇覽》（3世紀初，220-222）為類書體例正式形成之權輿，¹此體制經長時蘊釀、問世後，歷魏晉六朝之起、唐宋之興、明清之盛，約歷一千五百年之發展過程，逮至清初康熙時期《古今圖書集成》（18世紀初，1701-1728），其體例編制之完善駭備，造就了古代類書之典範、總結地位，此絕非驟然生成，蓋經長期文化資源之累積、編輯能力之充實而逐步推陳出新。在清初學術界博大恢宏之氣象輝映下，《古今圖書集成》承載著上古至明末清初豐沛的圖書文獻資源，交織著清初官方與學界之學術文化網絡，融貫著主編者陳夢雷（1650-約1741）個人之學養思維意識，其體系博瞻、經緯井然，主要反映清初康熙盛世知識世界之宏規全景，與其後乾隆朝叢書《四庫全書》之纂修同具里程碑意義。

關於前賢學者治理、研究《古今圖書集成》（後文

簡稱《集成》）之成績，時至今日可謂仍不甚豐，即自後世（約19世紀末之後）中外學者大量利用此一類書，多數係以參考工具書視角從中取資；若《集成》索引、目錄等研究工具之肇始，亦是緣自國外研究者據以從事漢學工作所編製，²顯示中國方面於早期反不如國外學者對《集成》價值之重視。本文初步蒐羅散見於學術論著或期刊篇章中與《集成》相關之各項材料，約略進行《集成》研究概況之梳理，除提出部分關鍵文獻以為描述重點，尙就前人研究成果所反映現象進行歸納分析。該研究史略之上限，若自清康熙成書後做為考察起點，可根據類書研究型態不同而區分為——傳統於文獻學範疇中進行輯佚、校勘工作；利用《集成》所錄專題資料發展各學科專門研究；針對《集成》本身編纂情況、內容特點進行闡發研究；著眼於《集成》索引與數位化之類書資源應用研究。³歷經傳統繼至現代，《集成》研究之表現型態代有轉換、漸有拓展，然研究主題於今觀之仍略顯單薄，大致係較傾向於《集成》編纂史實與版本流略之考述議題，對於其本身體系建構、編制類例則

* 作者為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

- 1 詳情可參考張滌華，《類書流別》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頁7-15；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新1版（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18。關於類書起源之說，歷來說法頗夥，一般公認意見，多從南宋·王應麟《玉海·藝文·類書》卷54：「類事之書，始於《皇覽》」之論，後世學者沿之，並由類書體例、編輯方式、引錄材料等面向為之辨明。如近代類書研究者張滌華、胡道靜均從此說；張氏與胡氏兩書論述材料頗豐，可取之詳參。
- 2 有關《集成》索引、目錄相關研究工具，可詳參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體制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08.6），頁31-37。自20世紀初期，首先在國外方面已有漢學研究者進行索引與目錄之編製，係1907年俄國瓦伯爾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索引》、1911年英國翟理斯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1913年日本文部省編《古今圖書集成分類目錄》；而中國方面則起步較晚，首部工具書係1957年蘭州大學圖書館編《古今圖書集成目錄》，後至1985、1988年方有廣西大學林仲湘等所編製、改良之多功能索引，係配合《集成》經緯交織之體例特點，為《集成》開創了質量兼備的檢索利用條件。
- 3 為突顯《集成》類書研究之時代特點，後文將以此四種研究型態為論述脈絡，但為行文方便，唯「《集成》索引與數位化研究」擬一併納入「《集成》本身闡發研究」中進行探討，將不另行敘述。參見註40、60。

多僅探其浮面，少有深刻論述。

首先，就現有文獻觀之，《集成》自清康熙、雍正時期編刊成書（1701-1728），其後歷乾隆、嘉慶諸朝，是時考據之學大興，古類書成爲學者大規模從事輯佚工作所憑藉之文獻品類；⁴然或由於乾嘉時期《集成》甫成書未久，其所收錄材料大多與時俱在，又因印數稀少，流傳未爲廣遠，⁵其間重視並利用《集成》進行輯佚、校勘者實際並不多見，可舉者甚爲零星。誠如類書研究者胡道靜指出：

從類書中搜輯佚文，要認識一條規律，叫做「書距律」。從唐宋時編的類書像《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能輯唐以前的逸書，……從明初編的類書像《永樂大典》中能輯宋、金、元人的逸著。很明顯，《古今圖書集成》中也一定保存著好些明代以及金元的逸著。可惜對於最後這個礦床，治理古籍者給予的注意還是不夠的。⁶

然若將審視標準放寬，首先運用於文獻學範疇內與《集成》利用研究稍有關聯者，蓋始於乾隆年間。據《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諭〉所載，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於「四庫全書館」開館前，因以

校輯《永樂大典》爲其端緒，乾隆帝嘗降諭旨「將原書（按：《永樂大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⁷按成書於明初（1403-1408）之韻編類書《永樂大典》，其輯佚價值頗受清當代士林重視，而乾隆帝對此亦表認同，並下諭將之與《集成》互爲校覈，藉以勘驗歷三百年間之文獻散佚情形，主要揀擇未經《集成》採錄並在當時已流傳稀少者，經由比勘以從《永樂大典》中彙訂湊合世不恆見之古書善本，以廣名山石室之藏；此即反映當時稽古之文治、輯佚之世風，乾隆帝不僅對《集成》展現欽尊之意，更指示將其運用於實際之學術活動中，關乎《集成》之利用研究即自伊而始。厥至後世，嘉慶年間張金吾從《集成》中發掘金代遺文，所輯多篇皆錄入《金文最》；清末民初學人陶湘嘗據以校補《天工開物》；民國後則有楊家駱就其中輯萬斯同《明史稿》七百萬言及明末清初所修方志數十種；胡楚生亦據以校釋《潛夫論》。⁸儘管著例不豐，然斯皆可謂利用《集成》校輯古書之一苗頭。而在文獻學範疇之研究中，對於《集成》本身引文之舛誤校勘亦極具意義，隨光緒年間《集成》再版，其第三版——同文版（1890-1894）書後所附龍繼棟《古今圖書集成考證》24卷，係《集成》

- 4 詳情可參考同註1，胡道靜之文，頁34-38；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頁252-260。清代輯佚之舉，蔚成巨業；其因之一，乃緣自乾隆中期從《永樂大典》中大事輯錄宋、元兩代佚書，此輯佚運動爲官修《四庫全書》之發軔，所輯佚書共388種，佔《四庫全書》之比重頗巨，給予輯佚工作者一大刺激。乾隆季年後，大規模從古類書和其他引書豐富的古籍中搜輯先秦、兩漢、六朝佚書之風潮就此掀起，其所憑藉多爲唐宋間之古類書，大抵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等爲輯錄焦點，清初官修類書極少成爲學者關注對象。
- 5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的版本及流傳〉，《古今圖書集成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2001），頁151-152。《集成》成書後，絕大部分被束之高閣，雍正年間僅賜與寵臣張廷玉兩部。後至乾隆朝始大量頒發，除在大內多處貯放之外，尙於乾隆中後期修建《四庫全書》之儲書七閣時，在《四庫全書》未成書前，每閣均預先貯進《集成》一部；而乾隆時臣民獲得賞賜者，包括四庫館臣舒赫德、于敏中、劉墉，以及向四庫館進呈圖書最多之藏書家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等，各蒙賞賜《集成》一部。
- 6 胡道靜，〈《古今圖書集成》的情況、特點及其作用〉，《中國古代典籍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201-202。（原撰於1962年）
- 7 詳情可參考顧力仁，《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頁289-295。《四庫全書總目》卷首〈辦理四庫全書歷次聖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諭：「……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數員，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按：《永樂大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擇其未經採錄，而實在流傳已少，尙可裒綴成編者，先行摘開目錄奏聞，候朕裁定。」是時乾隆帝對於校輯《永樂大典》展現高度興趣，而導《四庫全書》開館之先路，由輯佚之業一轉而爲叢書之編纂。
- 8 楊家駱，〈鼎文版古今圖書集成序例〉，《鼎文版古今圖書集成》第1冊（臺北：鼎文出版社，1977），序例6。

問世後首次大規模文字辨誤校正之成果，其對文句錯訛脫衍及引文存疑問題進行全面繁複之考證，有助於為後學利用《集成》引文材料提升其正確性，並對《集成》自身學術研究涵具啟發作用，其引領《集成》研究之初創功績當給予適度重視。⁹

其次，在利用《集成》所錄專題資料發展各學科專門研究方面，¹⁰ 主要亦以該書之橫向傳播廣度為關鍵性利用因素。蓋《集成》於清初成書 64 部，其後曾將少數幾部賞賜有功臣民，皇家藏本雖因頒賞而向民間跨進一步，然畢竟民間藏家以稀為貴，莫不視如瑰寶並將之深藏閣中，宇內讀書人見之不易，運用於學術研究自當幾希。《集成》問世後，於清朝中晚期業已斐聲海內外，首版曾有流傳至海外之記錄，較早為乾隆年間隨船載貿易輸入日本，¹¹ 另是光緒年間捐贈至美國著名大學，¹² 此外尚有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分藏殿版銅活字本之記載，¹³ 故在早期《集成》流通率、能見度不高之態勢下，仍於中外圖書文化交流史上留有彌足珍貴之記錄，誠對《集成》於漢學研究之利用價值與漢學知識

傳播具舉足輕重之影響。直至 19 世紀末葉，隨西方新式印刷術傳入，加之《集成》因文化發展需要再版印刷，故自首版之殿版銅活字本起，後至清末光緒年間美查版（1884-1888）與同文版（1890-1894）再版，¹⁴ 其間約歷經一百五、六十餘年，相較於中國研究風氣之黯然，自是由國外漢學研究掀起風潮，《集成》成為漢學家從事研究中得力較巨之東方文獻參考資料彙編，時譽稱「康熙百科全書」；¹⁵ 證以 20 世紀初國外方面《集成》研究工具之編製，以 1907 年俄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索引》為始，其後 1911 年英國與 1913 年日本分別均有索引、目錄出版，¹⁶ 由是觀之，《集成》因再版後普及傳播而形成利用研究之契機，因研究者有檢索或取得專題文獻之需求，爰編製為索引目錄工具，以助漢學研究工作中資料查檢所需。至若利用《集成》所錄專題資料進行研究，約於 20 世紀前期方見到較為具體之研究成果，1925 年中國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在撰寫〈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¹⁷ 時，曾大量利用〈庶徵典〉之災害資料以統計分析歷代氣候演變情況；1939 年美國學者麥

9 趙之富，〈光緒描潤本《古今圖書集成》及其《考證》〉，《歷史文獻研究》2（1991.8）：348-349。

10 同註1，胡道靜之文，頁46-47。胡道靜認為古類書具有「資料彙編」性質，門目較為完備，其將各專題資料輯集在一處，亦起著類似於「索引」的作用，故正確利用之，可在研究古代文化之學術工作中為研究者指點門徑，於資料搜集階段成為得力助手，如此構成了類書的第二特殊作用（按：第一特殊作用為校勘古籍、輯錄佚文）。

11 （日）大庭脩著，王勇、戚印平、王寶平譯，〈《古今圖書集成》的輸入〉，《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292-308。《集成》之輸入為江戶時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之大事，乾隆年間嘗有兩次記載，首次係於（日）元文元年（1736，乾隆元年）輸入《圖書集成繪圖》，再則為（日）明和元年（1764，乾隆二十九年）輸入《集成》原書。

12 張翔，〈《古今圖書集成》在美國的收藏〉，《圖書館雜誌》4（1997）：55-56。清光緒四年（1878）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容閱重回美國擔任副公使，出於對母校感謝之情，特攜一套《集成》殿版捐贈母校，連同容氏其他藏書一道成為耶魯大學圖書館漢籍收藏之濫觴；另在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亦藏有《集成》殿版，流傳經過未能確詳。

13 Lionel Giles, ed., *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edia*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11), p. xviii. 據英國漢學家L·翟理斯於1911年《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序文中所述，《集成》殿版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者係為全帙，藏於巴黎與柏林者則有殘缺；按此索引編於1911年，故《集成》流傳至英、法、德當於清朝中晚期，然未能得知確切時間與傳入緣由。

14 當時尤以英人鉛印之美查版印量多而流傳廣，於歐美多數研究機構或漢學家係藏有此一版本，至於石印之同文版量少質精，原即清廷為贈與各國政府或大學圖書館之用。

15 趙長海，〈《古今圖書集成》版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2004）：44-45。《集成》第二版扁鉛字本雖校勘不精，錯訛頗多，但卻是廣為流傳的一個本子，該版本國外收藏不少，國外許多學者據此檢索資料，名之為*K'ang Hsi Imperial Encyclopedia*，即《康熙百科全書》。

16 參見註2。

17 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頁58。（原載《東方雜誌》22.3（1925））

18 漢學研究通訊 27：3（總107期）民國97年8月

高文所著《中亞古國史》，¹⁸其參考書目漢文之部所列中古以後資料共計五種，《集成》即其中之一；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李約瑟以其多年心血寫成之《中國之科學與文明》¹⁹於1954年出版第1卷，序文中稱其最常查閱者即為《集成》，該書大量徵引〈乾象典〉、〈曆法典〉、〈庶徵典〉、〈山川典〉、〈藝術典〉及其他各典部關乎科學技術之文獻或圖表，將各專題材料運用、融通於中國古代科學發展史之各學門撰作中，該書資料考據詳明，於20世紀中外科學界引起極大迴響。《集成》以其收錄各門目專題資料之豐沛賅備著稱，其類書資源之應用價值往往為漢學家或歷史文化研究者所重視，依據各學科研究主題從中羅致相關素材，進而正確檢覈、引用並詮釋之，始成為專門學術性著作，斯為《集成》研究表現型態之一。

再者，針對《集成》本身編纂情況、內容特點進行研究，中國方面約至20世紀20年代後方以期刊專文形式呈現。²⁰由於傳世檔案有限、文獻記載不足，至民國後，早期對於《集成》迷朦未清之編纂史實議題亟待考證梳理，以致形成研究主題過度集中或雷同之現象。故自1928年萬國鼎〈古今圖書集成考略〉²¹為端緒，該文雖非僅關注於編纂考證論題，其對於《集成》整體內容編制亦有初略揭示，誠具開山之功；然考察後續無論於綜論或專論之文中，各文作者對於《集成》編纂之著作權歸屬、編者辨明及其生平考述、纂輯過程為私修或官修、銅活字製作暨刷印事宜等問題討論較為熱烈，而對於《集成》內容編制、體例形式之論述則泰半具有淺介或因襲性質。大抵而言，《集成》之編纂、刷印與版本考辨素為學界關注較多之論題，約莫至80年代後始

出現較為顯著之研究進展。一方面隨傳世檔案陸續發掘並整理出版，至1985年北京故宮學者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²²一文引述內務府檔案蔣廷錫所上奏摺3篇，攸關《集成》編纂歷程中數項關鍵性問題始逐步明朗化；包含康熙朝與雍正朝兩次開館人事變化、康熙末期定稿暨實際刷印情形、陳夢雷遭謫後蔣廷錫所為收尾工作，諸項論題因有檔案證據之提出，《集成》兩度開館及其間編校刷印時程方獲得初步確論，該文一出，至今經過部分學者補充更正，《集成》成書過程於學界約已形成基本共識。另一方面，《集成》至80、90年代已有中華版（1934）、文星版（1964）、鼎文版（1977）、中華巴蜀聯合版（1985）數種版本廣布流傳，依勢即出現編纂考辨以外之其他研究主題，諸如《集成》分類體例、索引與利用、數位化應用、各部類或各角度切入研究，相關論文庶幾見於80年代之後；²³觀乎此，前述分類體例等各主題均是需查見《集成》原書或以之做為輔助方能達成之研究，足見《集成》橫向傳播與應用普及程度對其研究主題之推陳出新亦具有深刻影響。誠然，因時代科技所趨而結合數位發展需求，同為研究型態轉變不可忽略之一要素。

承前，針對《集成》本身學術議題進行闡發研究，大致呈顯為三種論述形式，以下依序綜述之：

一、於圖書文獻學相關著作中論及並突顯《集成》地位

針對近代數部圖書文獻學相關論著進行開掘爬梳，約略可覘《集成》於相關學科發展中之學術價值與定位。

18 (美) 麥高文 (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撰，章巽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原著於1939年出版）

19 (英)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撰，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3）。（原著第1卷於1954年出版）

20 關於《集成》編纂之著作權歸屬問題為早期學者較為極力探討之面向，就筆者所見，最早於1911年漢學家翟里斯《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參見註13）序文中之考證文字實已具有考辨研究性質，該篇序文首據清人筆記或史料中相關記載逐步托出《集成》編者陳夢雷遭除名之史實原委；中國方面則是到1928年方有相關研究專文出現。

21 萬國鼎，〈古今圖書集成考略〉，《圖書館學季刊》2.2（1928）：235-245。

22 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故宮博物院院刊》1（1985）：32-35。

23 參見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6）」第四至第九項，同註2，頁263-268。

1930年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²⁴為近代首次使用「文獻學」名稱概括該門學問之論著，其在「編纂」專章中係以明清迄今所纂《永樂大典》、《集成》、《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大類書與叢書為文獻學上總結之大功業，該書雖能重視《集成》體制嚴謹瞻備之價值，然對《集成》內容編制之敘述係多逐錄自前述萬國鼎之文，未出新見。1987年謝灼華等《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²⁵於印本書時期縷述宋至清中葉間官府、私家、書院之圖書編刊與藏書發展，認為清官府之編書工程於後世影響最深者即《集成》與《四庫全書》，然其對《集成》編刊內容亦僅為稍事簡述。1990年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²⁶首次提出「圖書事業」概念，其揭櫫《永樂大典》、《集成》與《四庫全書》為中國圖書事業全盛階段之重要標誌，又作者以為《集成》對古典文獻進行了全面分類清理，極推崇其總結工作及地位，因此區分《集成》與清初官修諸類書而另立項敘述，要能詳述編纂經過、價值缺失、版本流傳等議題，惜在體例內容方面僅簡短帶過。1990年姚福申《中國編輯史》²⁷在清代編纂工作之專章中特標舉《集成》與《四庫全書》之編輯成就，在《集成》部分僅就編纂經過與內容體例做一般性敘述，然其提出《集成》於「彙考」之事目部分係編者自撰、全書有編者考證內容等，顯能就編輯意識角度著眼，十分可貴。1991年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²⁸於清前中期發展之專章中，同樣在清朝諸類書與叢書外另獨設《集成》與《四庫全書》之編纂工作為一節，對《集成》之編纂、版本、內容體例特點、缺失等予以說明。此外，2003年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學史》²⁹主要從文化思想視角出發，將《集成》、《四庫全書》及各典制體要籍之編修視為清前期史學中之重要

文化活動，故作者將類書與叢書納入史學史之探討範疇中，並特舉《集成》與《四庫全書》為例，要以突顯二者於歷史文化發展之典籍總結地位。近來2006年曹紅軍之博士論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印書研究」³⁰為一考辨嚴謹之學術佳構，文中提出活字印刷術係在康雍乾時期第一次為中央機構所採用，並分就銅活字與木活字印刷之版本代表《集成》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進行研究；其撮拾相關史料，針對《集成》於康熙末之後期刷印情形、蔣廷錫於雍正初之校改工作、《集成》刷印部數、銅活字製作方法數量等議題做出進一步考述，作者尋繹存世檔案中之細節線索，並結合實物版本進行比對映證，抽絲剝繭，逐一闡論，考據推斷更加合理詳明，無論對《集成》纂輯、刷印歷程中相關問題之澄清，抑或清官府書業與文化政策之研究均具創獲貢獻。

二、於類書綜論之文獻中探討《集成》特點價值

考察近代綜論類書之著作中對於《集成》特點價值所做探討，從中亦可大致描摩其發展地位輪廓。近代第一部系統研究古類書之專著，為194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初版（1985年修訂版）張滌華《類書流別》，³¹該書初步將散見於古籍文獻中與類書相關之材料進行彙集清理，其論類書之彌盛時期有三：齊梁、趙宋、明清，尤以明代及清初造其極，又以清康雍兩朝諸類書體例益精、檢索至便，類事之書至此而始盡其用；作者對《集成》之敘述止寥寥數語，未能論及體例編制議題，然其將《集成》廣大精詳之類書總結特性歸諸歷史趨向因素，較之僅以政治意圖詮釋者更為客觀公正。1971年方師

24 鄭鶴聲、鄭鶴春合著，《中國文獻學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29、132-137。（1930年初版）

25 謝灼華等著，《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臺北：天肯出版社，1995），頁209-212。（1987年初版）

26 來新夏等著，《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367-372。

27 姚福申，《中國編輯史》修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215-218。（1990年初版）

28 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上海：學林出版社，1991），頁182-190。

29 傅玉璋、傅正合著，《明清史學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頁105、239-243。

30 曹紅軍，「康雍乾三朝中央機構刻印書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6），頁55-69。

31 同註1，張滌華之文，頁32-33。

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³²係以傳統文學視角探討類書與文學間之相互影響性，認為類書之起乃因古代文學創作注重用典、隸事之風氣使然，並視類書之唯一用途在於供詞章家獵取辭藻「獮祭」之用，此論似較偏頗；又其對同樣於清初康熙時期纂成之《淵鑑類函》給予「集『獮祭』之大成」的評價，相對於《集成》而言，作者認為《集成》並非專供詞賦取材之用，已能體識其與《淵鑑類函》性質之不同，然其後未有深入論述，在專論《集成》之一節係多為文字材料之彙錄。1978年劉葉秋《類書簡說》³³中闡明類書之演變概況，認為類書範圍逐漸擴大係與其編撰目的有著密切關係，為將積累日富之文籍進行總結清理，厥至明代《永樂大典》與清代《集成》方突破以往類書內容形式之範圍；而作者尤能重視類書體例之嚴密性而推崇《集成》形式革新之功，並在常用類書簡介部分能引原文為例，俾使讀者具體瞭解諸類書體例特點，亦頗具參考價值。

研究視野多元而寬敞、論述資料深層而豐富之類書研究力作於近年問世。其一為中國方面2001年夏南強之博士論文「類書通論——論類書的性質起源發展演變和影響」，³⁴該文在對類書之定義、起源、類型、歸類諸方面予以系統闡述後，由數部代表性類書之實例結合，剖析唐代及其前、宋代、清代類書之「分類體系」發展演變，緊接從文化大角度出發，探討類書「內容體系」在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思想影響下之客觀產生原因；作者透過對《集成》分類體系之解析，指出其係在傳統類書天地人事物之思維基礎上，受《大學》修齊治平學說啟發，從而構成一完整之知識框架，其類目組織之嚴密性超越往古、巧具深意，故在《集成》之內容體系方面，係以「百科全書式」統括其類書總結特性，揭示其博采眾長、兼賅群籍之成因，乃在編者戮力為之、轉趨經世致用、廣納子集材料、學術知識澱積、西洋科學東漸等因素，致使《集成》後來居上，達到編纂體系

極精、應用層面較廣之古類書首要地位。其二則是臺灣方面2005年孫永忠之博士論文「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³⁵該文著意於辨明類書於書目中之歸部現象，瞭解類書在古代學術體系中之地位，藉以釐析義界問題，區別性質範圍，進而追溯類書淵源，縷探歷朝類書因時代需求遞有不同所呈現之體例新變特性，並就類書編纂工作之心理層面動機研判類書發展之歷史規律；該文論至《集成》體例新變部分，所列各項特點係參酌前人研究為主，然作者能適切貫徹因「需求」刺激而提升、精進類書功能性之理論，闡發《集成》體例周詳嚴謹之承繼與創新特性，見解精到有力。

三、專書與期刊論文中以《集成》為研究主體之專題論述

透過前述二種論述形式之文獻簡析，主要可藉以省察《集成》於圖書文獻相關學科及類書體制發展中之價值定位，而依據各著作探討主題面向之不同，相對在諸作中所體現《集成》面貌特質也就各異。如圖書文獻學相關論著中對於《集成》價值之突顯，主要係輝映出《集成》在文獻學、圖書與圖書館史、編輯史、出版史、印刷史、版本學，甚或在文化史、史學史等相關學科之體系脈絡中佔有一席之地；又顯因《集成》具典籍總結價值，各論著往往將《集成》與前後期大型圖書編纂活動暨統理成果並舉齊觀。此外，在綜論類書之著作中，對《集成》之關注焦點主要即在其「類分型」類書之廣博周延體系，著意於《集成》包涵大度、條理精審之實用價值，又以《集成》成書較晚，因而在類書體制發展之評價中，其總結地位遠高於「韻分型」類書《永樂大典》。在前二種論述形式中，諸作因具通代史之綜觀性質，涉及《集成》面向未為深廣，至於在以《集成》為研究主體之專書、專文中，各專論研究所反映現象為何，本文將歸

32 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臺中：東海大學，1971），頁238、250-264。

33 劉葉秋，《類書簡說》（臺北：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頁20-22、80-82。（原撰於1978年）

34 夏南強，「類書通論——論類書的性質起源發展演變和影響」（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博士論文，2001.4），頁39-41、77-81。

35 孫永忠，「類書淵源與體例形成之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6），頁235-239。

納為如下數方面予以討論，並將部分重要專書專文³⁶之撰作內容一併融入各項中進行研究綜述：

(一) 系統化之論著貧乏，單篇論文多偏重《集成》編纂及版本考述主題

統察近人對於《集成》之研究論述，早期多以單篇論文形式呈現或散見於文獻學、類書研究等相關論著中，首度以圖書形式出版者於晚近始現。1997年由齊秀梅、韓錫鐸合著之《亙古盛舉：《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³⁷乃標舉該二者之類書與叢書總結性質，全書約以十分之一的簡要篇幅敘述《集成》編者、纂輯、刷印、內容、價值、版本等基本概況，雖主要取材於前人成果，研究成分甚稀，然觀其陳述資料大致已能將《集成》編纂要況與內容特性確實點出。

專事研究《集成》並在質量上取得較佳成績者首推2001年裴芹所撰《古今圖書集成研究》，³⁸全書以系列論文形式呈現，包含研究性質之論文7篇、整理性質之書目2份及資料3份。該專書首度以《集成》做為研究主體並突破以往論者關注範疇，由古代類書自身體制發展、清代圖書編纂文化風盛、《集成》成書原委歷程等外緣議題著手，進而深入《集成》文獻內部具體剖析其體例結構及特點缺失、按注體系及內容作用，尙就《集成》徵引方志材料之總彙價值、《集成》版本流傳概況等文獻學相關論題進行審視闡析。質言之，作者對《集成》之觀照層面涵蓋了文化發展、史學考證、文獻探微諸面向，尤在《集成》體例暨按注結構之目錄學方法運用層面獲得益為深化之研究進展，文中論述精闢，輔以

詳實例證之解析，對於《集成》全編架構之連繫變通原則已初具較為咸全之認知及探討，全書可謂新意迭出、灼見紛呈，多處論點足可啟發後學研究思理，為《集成》研究領域具實質先創意義之論著。

在學位論文部分，至2006年止，僅見2003年中國方面滕黎君之碩士論文「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應用價值」³⁹乙篇，該文著力於揭示《集成》本身及其索引、電子版資料庫之應用價值，注重《集成》之「為用」層面。作者首先透過對《集成》本身創新性和實用性之論述而明其價值所在，再則論及當代生活中如何利用《集成》，闡明為《集成》編製索引及數位加工之必要性，而該文以廣西大學林仲湘等編索引及電子版為探討中心，以此一索引具學術性、便檢性和普及性三特點，說明其如何為充分利用《集成》及編製精密便檢之古典文獻索引起著示範作用。文中竭力突顯《集成》之具體實用特性與資訊利用優勢，為文精簡而條理分明，進一步統整並拓寬了《集成》索引及其數位化應用之論述層面，與裴芹闡發《集成》學術內涵之角度不同，斯為《集成》研究之另一型態。⁴⁰

綜觀上述以《集成》為題之論著或學位論文截至2006年僅有3篇，其中確實具研究性質者唯裴芹與滕黎君之作，然若嚴格審視之，裴芹論著係以單篇論文形式統為一書，滕黎君學位論文專事探討應用議題，故實際而言，能夠全面而深刻闡述《集成》自身學術價值及其相關論題之著作，時至今日可謂極其貧乏，未有系統專論之新作出現。另有以期刊專輯形式呈現者，為2006年12月中研院文哲所之學術刊物《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36 以下所舉述之文獻，除了提及以《集成》為研究主體之專書、專文，此外尚擇取少數並非以《集成》為研究主體之篇章，針對其中論及《集成》而可資探討者予以提出說明。

37 齊秀梅、韓錫鐸合著，《亙古盛舉：《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瀋陽：遼海出版社，1997）。其後至2005年，同樣由齊秀梅、楊玉良等多位北京故宮專家合著之《清宮藏書》，對清代大型圖書編纂活動及其典藏係以「四部宏篇巨著」統為一節，此中《集成》部分即以先前1997年撰述內容為基礎加以補充修訂，主要對於《集成》之版本流傳與首版存藏概況做了較詳細之補述。見齊秀梅、楊玉良等著，《清宮藏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82-95。

38 參見註5。

39 滕黎君，「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應用價值」（南寧：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03.5）。

40 此研究型態係前文所述及「著眼於《集成》索引與數位化之類書資源應用研究」，參見註3。

所載「《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文獻價值」專輯，⁴¹共收7篇討論〈經籍典〉經學部類文獻內涵之研究專文，各文大抵均能闡明其所述部類之內容編排、文獻價值及缺失、查檢注意事項等，尤以部分專文尚能精研其引文取材、按語註釋，考辨文句或著錄相牴之處，甚或考察《集成》與其同時刊成諸書之關係，故該一專輯雖非系統論著，然其深入發掘〈經籍典〉經學文獻之特點價值與應用情況，補強此領域文獻學研究面向之不足，而該專輯以《集成》某典部為探討範圍，亦為重要而基礎之研究開拓工作，深具意義。

至於在期刊或書籍中所載單篇論文部分，其所呈現研究概況約可由筆者所編「《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6）」進行考察；經計量分析顯示此一領域之研究焦點多以考述議題為主，所錄書目約佔四成以上係以《集成》編纂、版本考釋為探討中心，若將部分綜論性質文章中與考述議題相關者計入，則以幾近五成上下之比重傾向探析該一議題。儘管至20世紀80年代後已有其他研究主題之拓展，基本上，學界對於《集成》編纂、刷印、版本情況之討論自20年代起至今仍未曾稍歇。如以1928年萬國鼎〈古今圖書集成考略〉⁴²對編者與版本之簡要考述為濫觴，其後踵作多以「陳夢雷與《古今圖書集成》」為題，著意於為《集成》實際編者正其名、考其實。1962年胡道靜〈《古今圖書集成》的情況、特點及其作用〉⁴³開宗以「故不逮

新」之理闡明《集成》涵納知識質量之精良，再則著重編者及編輯經過、版本、中外學者利用情況之論述，後學參酌引用該文者頗眾。1964年蔣復璁〈古今圖書集成的前因後果〉⁴⁴與蕭孟能〈文星版「古今圖書集成」序〉⁴⁵為政府遷臺後《集成》首次印行（文星版）所撰之紹述總序文章，二文對於《集成》成書與各版本刊印經過縷述甚詳，相關原委掌故史料蒐羅豐富，足資吾人引證參考之用。嗣後1977年楊家駱〈鼎文版古今圖書集成序例〉⁴⁶亦於編者考證方面用力頗勤，然因是時可證《集成》立館之關鍵性檔案尚未問世，其考論結果以為《集成》絕非出自官修，於今觀之即顯有差謬；然以作者為文欲洗夢雷沉冤之志，實亦具有深意，又該文對《集成》之內容、思想、體系剖析極為精到，能發前所未言，耳目一新。又前已述及1985年楊玉良〈《古今圖書集成》考證拾零〉⁴⁷一文所考《集成》編刊時程，該文明確提出數則重要檔案奏摺做為引證，其考辨結論於學界影響較鉅。而1998年崔文印〈說《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編者〉⁴⁸前半篇幅係以闡述《集成》結構特點為主，尤以具體實例論證《集成》緯目設置之主次關係，新意層出，後半篇幅則就相關材料勾稽《集成》編纂原委，惜其未見楊玉良考證結果，仍主陳夢雷私撰之說。後至2000年王鍾翰〈陳夢雷與《古今圖書集成》及助編者〉⁴⁹大抵闡論陳夢雷其人、《集成》其書、《集成》助編者三部分，該文首度將助編者議題單

41 該專輯係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4（2006.12），據林慶彰先生之緒言，該專輯以探討〈經籍典〉之經學文獻學術價值為主，而〈經籍典〉（按：共66部）中屬於經部者共19個部類，各篇即以該19部類為單位進行深入探討，目前該專輯僅載7篇（按：首篇為〈經籍典〉總論），將來擬與另外13篇專文編為一書正式出版。該專輯收錄論文如下：陳惠美，〈《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中的文獻資料及其運用〉，頁5-58；劉千惠，〈《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禮記部》的文獻價值〉，頁59-79；劉康威，〈《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儀禮部》的文獻價值〉，頁81-101；葉純芳，〈《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周禮部》的文獻價值〉，頁103-120；黃智信，〈《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三禮部》的文獻價值〉，頁121-135；黃智明，〈《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爾雅部》的文獻價值〉，頁137-162；馮曉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經學部》初探〉，頁163-181。

42 同註21。

43 同註6，頁189-206。

44 蔣復璁，〈古今圖書集成的前因後果〉，《珍帚集》（臺北：自由太平洋出版社，1965），頁109-123。（原撰於1964年）

45 蕭孟能，〈文星版「古今圖書集成」序〉，《文星版古今圖書集成》第1冊（臺北：文星出版社，1964），頁1-56。

46 同註8，序例1-38。

47 同註22。

48 崔文印，〈說《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編者〉，《史學史研究》2（1998.6）：60-67。

49 王鍾翰，〈陳夢雷與《古今圖書集成》及助編者〉，《燕京學報》新8期（2000.5）：187-201。

獨立項進行考述，於《集成》編纂分工實情可資補佚。2001年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編纂考〉⁵⁰與〈《古今圖書集成》的版本及流傳〉⁵¹收錄其專書中，二文分別描摩《集成》編刊原委與版本沿革，作者力排未符史實之說，疑所當疑，其對於史料考辨之詳實程度更勝以往諸作，為前人考述基礎上後出轉精之作。又2004年趙長海〈《古今圖書集成》版本考〉⁵²係作者經多方考察並對照各版次實物，其針對具體細節逐一考證以收糾謬之效。至近2006年黃權才〈《古今圖書集成》六論〉⁵³文中討論《集成》之編纂倡議人、書名命名者、校訂領銜人、初版促成者，以認清《集成》成書歷程中相關人物所導引之歷史作用，其立意角度客觀；然該文簡析《集成》於康熙朝遭冷遇及相關記錄缺失之問題，指出《集成》與康熙帝敕編著作之編輯思想不一致，乃其遭冷遇之原因，此論仍有待進一步商榷。⁵⁴

誠然，囿於《集成》部頭過巨，欲就《集成》本身進行綜理、研究實屬不易，在前作局限一隅、專論主題貧乏之氛圍下，通盤觀照不足，研究成果自未能卓著，如是因循往復，往往造成研究者力有未逮、望而生畏之感，就《集成》之研究發展而言亦相形成為阻礙處。前人對於《集成》研究之深化拓展範圍固極有限，又針對編纂考述議題而言，由於目前尚未有新史料發見問世，至今多數論者僅能於1985年楊玉良考證之基礎上陸續匡正補足，可資討論之原始材料欠缺，勢難有突破性之研究進展，斯又其局限之一。可喜者在於2001年裴芹專書之出版，於此乏人問津之領域終獲發掘《集成》學術價值之引領研究者出現，實具前導貢獻地位，然至今已越數年，繼之而作者幾為鮮見；而觀單篇論文方面，

除大致較偏重考述議題外，又部分篇章或為簡論概述，或為拘泥管見，或為因襲成說，只少數能潛心探究、發為新見。總體而言，其研究成績仍未能善盡發揮《集成》學術內涵，誠有待學界檢討此一領域研究質量貧乏現象背後所浮現問題所在，從而精進、強化《集成》學術研究範疇之深度與廣度，是為後學須致力改進之目標方向。

（二）未能將《集成》體制內容與清初學術文化脈絡密切結合進行研究

前人研究中對於《集成》成書歷史背景之探討，多由編者陳夢雷之生平際遇及其於康雍兩朝所捲入政治事件著手，能夠由清初學術文化背景切入《集成》研究者甚為罕見；換言之，能夠確實以學術文化角度考察當時歷史環境對《集成》體制內容造成影響之相關探討極稀，所可考見者僅有數篇。於此用力較深者亦以裴芹為代表，1990年裴芹所撰〈《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⁵⁵從文化政策視角切入探討清朝官方編書風氣，著重闡述《集成》對《四庫全書》編纂諸原則與體例之啟發，指出政治、文治需求為該二書編纂之共同出發點，並揭示其先後採取類書與叢書形式進行典籍之清理乃各適應著時勢要求；該文已能點出清康熙朝與乾隆朝編書型態之不同主要係緣於政治文化、思想統馭等因素影響，已初步能意識到清前期學術思潮之轉化現象。而在2001年裴芹專書中〈《古今圖書集成》與清代編書之風〉⁵⁶一文同樣能反映該一意識，且更傾力於突顯《集成》超越康熙朝官編諸書之革新價值。然觀裴芹二文尚未能具體指陳康熙時期於學界所蘊釀之學風思潮與官方

50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編纂考〉，《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27-42。

51 同註5，頁141-155。

52 同註15，頁43-47。

53 黃權才，〈《古今圖書集成》六論〉，《圖書館界》1（2006）：29-33。

54 前述所需留意者，如胡道靜、楊家駱、崔文印、黃權才諸作保持《集成》為陳夢雷私撰之說，今據存世檔案史料可證私撰說為非，《集成》編印工程浩大繁難，於其成書環節中，洵因官方各項資源、條件及諸相關因素之支持，方有促成萬卷巨帙之可能性，故部分文章於考辨過程中不免存有或多或少之疏謬情形，引用時仍需審慎評估之。

55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1（1990）：11-15、20。

56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與清代編書之風〉，《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17-26。

所建構之政策核心，故仍有進一步討論空間。至前述2003年滕黎君之碩士論文「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應用價值」則將清前期學術轉化趨向做出更為明確的表達，⁵⁷該文論及《集成》實用原因特性，以為《集成》之編纂無疑是明末清初「經世致用」思潮影響下的一次實踐，編者之思維模式、知識結構亦是受此思潮薰陶而定型，其論述實能切中肯綮。此外所需留意者，部分文章如1990年邵明〈儒家學術文化與類書編撰〉⁵⁸將《集成》編纂背景與乾嘉時期升高為學術主流之「考據學」（或謂「漢學」）互為呼應，將《集成》對典籍文獻之總結視為清代儒家學術文化之「考據學」成就，其說於理論上則不盡適切；⁵⁹過於籠統刻板地將最能代表清學特色之乾嘉「考據學」與清初康雍成書之《集成》背景相結合，此乃未能充分洞悉清前期學術文化發展脈絡使然。筆者以為若能精確扣諸清初康雍時期學術思潮、文化政策並與《集成》體制內容密切結合進行相映探討，以深刻掘察並彰顯其學術本質、文化內蘊為研究取向，方能使《集成》價值具體突出於清朝學術發展史上，並由此提升其與《四庫全書》相對失衡之學術高度，從而改變一般學界對類書價值作用所持之偏頗態度，改善《集成》素來不受學術研究領域重視之低迷風氣，應是當前可進一步嘗試之研究方式。

（三）重視《集成》索引利用與數位化面向，然對其本身體例編制著墨未足

綜觀《集成》研究之發展脈絡，約至20世紀80年

代後始有考述議題外之研究主題拓展，其中著眼於《集成》索引與數位化之研究大抵而言數量較豐，為晚近以來學界關注較力之研究面向，可視為《集成》研究之又一型態。⁶⁰20世紀初起國內外已有多種索引問世，然多數係為類目索引或局限於某典部、某資料類型，首度系統全面爬梳《集成》經緯交織特性，進而細緻揭示書中內容資源者，厥為1985年由廣西大學林仲湘等編製之《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同年林氏並發表了〈《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編寫〉⁶¹一文。後至1988年該《索引》經修訂增補而收入中華巴蜀聯合版，同年林仲湘亦發表〈訓詁與古籍索引——兼談《古今圖書集成》索引的編寫〉⁶²以告讀者其編製成果，並結合實例說明訓詁之法於編製古籍索引過程中之作用。又1989年錢亞新〈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新編索引〉⁶³即從體系、類型、著錄、字型、參照、排檢六方面闡發林仲湘等編索引之特點價值，推崇該《索引》於古籍索引發展中所具開拓創新之功績。嗣後陸續有多篇專文探討該《索引》編製之實務、理論及其評價；又歷十餘年左右，該編輯團隊於1999年完成索引資料庫之建置，由廣西金海灣電子音像出版社所出版。而隨著電子版之推出，相關引述與討論文章不斷，如2000年張學軍〈《古今圖書集成》原文電子版及其對圖書館古籍工作的影響〉⁶⁴主要探討該電子版對古籍館藏建設、管理、參考工作之影響；2003年孫金花、張秀玲〈古典文獻檢索的一件利器——評光盤版《〈古今圖書集成〉索引〉〉⁶⁵則以檢索者角度針對其特點與不足處進行客觀之分析評論；又前述2003

57 同註39，頁14-16。該文指出在清初知識界之轉型中有兩種相輔相成的趨向，一是可以被稱為「經世學」的趨向，一是後來轉化為「考據學」的經典之學；文中將《集成》之編纂思想背景與「經世學」密切結合進行探討，當已能體識其與乾隆《四庫全書》編纂時相對不一之學術傾向。

58 邵明，〈儒家學術文化與類書編撰〉，《大學圖書館學報》4（1990.8）：24-32。

59 可參考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98-207。大抵而言，清初學術是由宋明理學向乾嘉漢學轉換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考察清朝儒學發展過程中的漢、宋關係，約歷經順、康、雍三朝的「漢宋不分」，漢、宋二學交互影響當時的學術風貌；而後乃歷乾、嘉時期「漢宋對立」之階段性轉變，漢學成為主流。

60 此研究型態係前文所述及「著眼於《集成》索引與數位化之類書資源應用研究」，參見註3。

61 林仲湘等，〈《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編寫〉，《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1（1985）：28-32。

62 林仲湘，〈訓詁與古籍索引——兼談《古今圖書集成》索引的編寫〉，《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1988）：71-75。

63 錢亞新，〈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新編索引〉，《圖書館界》2（1989.6）：41-45。

64 張學軍，〈《古今圖書集成》原文電子版及其對圖書館古籍工作的影響〉，《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4（2000）：88-89。

65 孫金花、張秀玲，〈古典文獻檢索的一件利器——評光盤版《〈古今圖書集成〉索引〉〉，《圖書館建設》3（2003.5）：107-110。

年滕黎君之碩士論文「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應用價值」⁶⁶ 殆為深入剖析該索引與電子版應用價值之統合性專作。中國方面關於廣西金海灣電子版之紹介述評文章頗夥，而在臺灣方面則有故宮、東吳合作《集成》數位計畫主持人陳郁夫所撰 2000 年〈古今圖書集成的結構分析與資料庫規劃〉⁶⁷ 及 2004 年〈「故宮東吳」數位古今圖書集成技術報告〉，⁶⁸ 可藉以瞭解該資料庫之結構規劃與技術成果，此乃由編製者角度著眼，而從兩岸相關文獻探討中即大致可窺知《集成》數位化發展概況。

相較於晚近學界對《集成》索引與數位化應用議題討論之熱絡，若僅就發表文章數量而言，關於《集成》自身體例編制之探討則相形清寂。將《集成》體例編制論題單獨提出撰為專文者係以 1983 年任寶楨、徐瑛〈《古今圖書集成》編排體例簡析〉⁶⁹ 為嚆矢，該文主要針對《集成》編排體例、複分項（緯目）設置之突破創新處進行剖析，指出其事文主次間出、體例因類制宜、收錄圖表列傳、目錄載次完備等變革特點。後 1985 年同為徐瑛、任寶楨所撰〈《古今圖書集成》的分類體系〉⁷⁰ 則就類書分類之宏觀體系探求《集成》與前代類書之一脈相承關係，並簡析其自身所獨具分類細密、區分詳晰之結構特點。1989 年劉培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排檢特徵初探〉⁷¹ 係就〈藝術典·醫部〉之分部單

行版本探析其按類分編、主題標識、具中醫特色等編檢特徵與表現。1992 年柳較乾、陳秀英〈《古今圖書集成》分類及編排體例述評〉⁷² 文中簡論《集成》分類編排之結構、特點與缺陷，以參酌前說為其述評之基礎。1993 年王純〈《古今圖書集成》的分類編排〉⁷³ 亦淺探其分編特點，著眼於讀者為用之便。直至 1994 年裴芹〈談《古今圖書集成》的「參見」〉⁷⁴ 方以較為新穎之立論角度析論《集成》於〈凡例〉與按注中所運用目錄學「參見」之法。再則 2001 年收錄裴芹專書中〈規模宏大 分類細密 縱橫交錯 次序井然——談《古今圖書集成》的結構體例〉⁷⁵ 與〈《古今圖書集成》的按注研究〉⁷⁶ 二文，針對《集成》通編之經緯架構、正變關係、按注體系進行全面觀照，論點闡述益為精深，實例舉證愈發詳明，在《集成》體例編制研究議題中，裴芹之文誠為深入淺出之學術佳論。

此外，關於《集成》體制之探討，尚存在部分綜論類書分類體例之專文中，如 1986 年羽離子〈類書的分類和目錄〉⁷⁷ 於類書之多重目錄與複分法運用方面論及《集成》體例特出處；1989 年馬明波〈從類書的類例透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⁷⁸ 以《集成》緯目設置方法之創新視為類書內容表述之進化特徵；1989 年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⁷⁹ 亦提及《集成》複分技術之嚴密性；1991 年羽離子〈類書分析分類法的

66 同註39。

67 陳郁夫，〈古今圖書集成的結構分析與資料庫規劃〉，「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漢籍數位典藏組」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6.29-7.1）。

68 陳郁夫，〈「故宮東吳」數位古今圖書集成技術報告〉，「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論文（斗六：雲林科技大學，2004.10.29-30）。

69 任寶楨、徐瑛，〈《古今圖書集成》編排體例簡析〉，《高校圖書館工作》2（1983）：75-78。

70 徐瑛、任寶楨，〈《古今圖書集成》的分類體系〉，《四川圖書館學報》3（1985.8）：47-51。

71 劉培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排檢特徵初探〉，《圖書館工作》1（1989）：46-49。

72 柳較乾、陳秀英，〈《古今圖書集成》分類及編排體例述評〉，《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1992）：49-53。

73 王純，〈《古今圖書集成》的分類編排〉，《圖書館員》1（1993）：7-8。

74 裴芹，〈談《古今圖書集成》的「參見」〉，《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1994）：59-61。

75 裴芹，〈規模宏大 分類細密 縱橫交錯 次序井然——談《古今圖書集成》的結構體例〉，《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43-63。

76 裴芹，〈《古今圖書集成》的按注研究〉，《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64-86。

77 羽離子，〈類書的分類和目錄〉，《圖書館研究與工作》4（1986.11）：25-28。

78 馬明波，〈從類書的類例透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廣東圖書館學刊》1（1989.3）：23-28。

79 李守素、梁松，〈試論類書的分類體系與分類技術〉，《大學圖書館學報》5（1989.10）：22-28。

立類原則及其體系的兩重性)⁸⁰以《集成》為例說明其層累制分類體系所具主題法與分類法結合之特性；1992年陳大廣〈關於《中華大典》框架與索引的探討〉⁸¹提出古代對文獻之類分主要可區分為兩派別，其一為學科分類派「四庫法」，其二則是事物分類派，即稱之「集成法」；1997年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⁸²於類書體式方面嘗以分目層次探討各體類書，以《集成》為多目體類書中體例嚴密之典型，認為其〈目錄〉與〈凡例〉之設置頗便檢索，文獻編排有例可循而又善於變通，要能闡明其體制嚴謹靈活之特性。由是觀之，於《集成》體例編制研究中，各文探討角度亦不甚相同，或述結構特徵、材料編排，或考目錄學方法技術，或探分類體系思維，各探討面向均有其獨到處；尤以裴芹專文之論述層面較以往研究更為周遍，其掌握《集成》之總體結構，亦將有助吾人針對各典部體系再行深化研究提供可行線索，如主要可就某典部進行獨立研究或針對相關典部間進行關聯分析，部分深化議題仍有待後學充分開掘。此外，前述諸作已能體察《集成》非僅以鴻篇巨制著稱，其體例之嚴謹賅備乃為《集成》獲致類書發展「總結」、「集大成」評價之重要關鍵所在，然以各文在研究深度上仍未能具體闡發《集成》之編纂體例淵源、革新及其影響等有關論題，故仍有必要於此潛心精研以補是方面之不足。

(四) 針對《集成》各典部進行探討者鮮見，往往就內容著眼，較少言及體例

就《集成》6彙編、32典、6,117部之部類涵量而言，近人對各典部研究數量可謂與之極不相稱，猶林與樹之比。若以《集成》原書編次做一區分，計方輿彙編有1992年范能船（山川典）、2004年王會均（職方典瓊州府部）2篇；明倫彙編有2003年劉怡伶（閩媛典）1篇；博物彙編有1940年胡經甫（禽蟲典）、1983年邱紀鳳、1987年張松生、1995年趙立勛、2000年曾秀燕（以上藝術典醫部）、1989年葉程義（藝術典漁部）、2000年徐華龍（草木典）等7篇；理學彙編有1999年陳海鳴（學行典觀人部）、2001年黃正雨（學行典讀書部）、2004年周孟貞（學行典恬退部）、2006年陳惠美、劉千惠、劉康威、葉純芳、黃智信、黃智明、馮曉庭（以上經籍典）等10篇；經濟彙編則有1986年吉聯抗（樂律典）1篇。⁸³此中多數係以各典部內容介紹、揭示，或以其專科資料之意涵詮釋為關懷面向，僅1989年葉程義〈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漁部引書考〉⁸⁴與2006年「《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文獻價值」專輯所收陳惠美等7篇，⁸⁵屬文獻目錄學範疇之研究。此外尚有非針對單一典部，而是由某一角度研究《集成》者，包含以《集成》從事校勘研究、⁸⁶《集成》所收錄某資料類型之整體探討、⁸⁷某學科於《集成》中之文獻分布、⁸⁸《集成》於某學科研究之史料價值⁸⁹等論題，數量雖少，然研究主題已較以往有所突破，對於以多元角度發展《集成》學術研究層面亦有其前驅性價值。由上述《集成》各典部或各角度研究所呈現觀點而言，各文所著重

80 羽離子，〈類書分析分類法的立類原則及其體系的兩重性〉，《圖書館雜誌》5（1991.10）：52-53。

81 陳大廣，〈關於「中華大典」框架與索引的探討〉，《中國圖書館學報》4（1992.10）：56-62。

82 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頁311-317。（1997年初版）

83 詳細書目請參見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6）」第七項「各部類研究」，同註2，頁266-267。

84 葉程義，〈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漁部引書考〉，《中華學苑》38（1989.4）：191-253。

85 陳惠美等7篇專文係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6.4（2006.12）「《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的文獻價值」專輯，參見註41。

86 龍良棟，〈古今圖書集成所收嘯餘譜本中原音韻校勘記〉，《漢學論文集》（臺北：驚聲文物出版社，1970），頁323-400；龍良棟，〈古今圖書集成所收劉子新論校勘記〉，《淡江學報》（文學部門）13（1975.1）：69-110；楊軍，〈《古今圖書集成》所見唐文校讀記〉，《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1991）：37-43。

87 袁逸，〈《古今圖書集成》中的人物傳〉，《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1983.4）：55-56；裴芹，〈《古今圖書集成》與方志〉，《古今圖書集成研究》，頁87-96。

88 楊貴嬋、王可，〈古今圖書集成中藝術文獻的分布〉，《設計藝術》3（2003）：68-69。

89 瀾平，〈圖書集成與中國社會史搜討〉，《新中華》2.11（1934.6）：頁數不詳；郭猛，〈從《古今圖書集成》看中菲兩國的歷史文化交融與衝突〉，《廣西文史》4（2004）：38-42；余漢桂，〈《古今圖書集成》在漁業行業史志研究中的史料價值〉，《廣西文史》3（2005）：96-100。

者多在《集成》所收錄文獻知識內容本身，而較少以《集成》所精心建構之知識體系或由其類書編纂之體例形制進行考量；實際上，以宏觀視野全面探討《集成》體系內涵固有其難處，而以《集成》各門目有其專科研究價值，且其體例於「三經二緯」雛型下又具有因類制宜特性，若首先能針對各典部進行微觀而深化之研究，再行予以整合或探勘其間關聯，抑或從中觸發其他可行之研究議題，對於《集成》局部或全面之研究發展誠應具有相當助益。

(五) 利用《集成》者眾，然研究《集成》者匱乏，於明清三巨書中趨於弱勢

前已述及在部分圖書文獻學專著中，論者多將《集成》與明清前後期大型圖書編纂成果齊觀，學界並譽稱《永樂大典》、《集成》與《四庫全書》為中國學術史、文化史上之三巨書，三者分別以不同纂輯形式而樹立為中國圖書事業全盛階段之重要標誌。此中《集成》以其「類分型」類書之實用特性與類書史上之總結價值為世

所重視，且在實際面上，其全帙保存完好、未經散佚，至今已有多種版本廣布流傳，⁹⁰輔以現代數位化應用優勢，該書所收錄清康熙前古代文獻材料之便檢性、全面性、系統性，往往為今日學人參酌利用之資。以下（左下圖表）試就 1998 至 2005 年間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其引用文獻凡臚列有《集成》者，進行各學科類別與各年份頻率統計，藉以觀察逐年利用趨勢。

由此表可據以分析《集成》於學位論文研究中之利用概況，就學科類別而言，引用頻率以人文學類為最高且呈現明顯集中趨勢，約佔全數四分之三，其次則為藝術學類與經社心理學類，而其他眾學科所呈現則較為零散稀落；再則觀其逐年利用頻率，自 1998 至 2005 年總體走向係呈現上揚趨勢，至 2002、2003 年攀升幅度較為明顯，此一表現乃是與臺灣地區各電子版研究工具之推出相互輝映。⁹¹而中國方面在 2003 年滕黎君碩士論文「論《古今圖書集成》及其索引的應用價值」亦曾進行相關調查，該文以中國全文學術期刊網 1994 至 2002 年間期刊論文引用《集成》頻率為例，⁹²其統計結果在 2,000 多筆資料中亦以文史哲類引用頻率最高，且歷年引用亦逐步呈現上升趨勢，觀其數據則以 2000、2001 年攀升較顯著，此係與廣西金海灣電子版推出之影響較具相關性。⁹³

由上顯示近年因《集成》索引與資料庫更趨完善開發，對於各領域之學術研究有著引用率高、利用面益廣之進展態勢，然而就目前《集成》本身學術研究發展言，其研究質量則相形匱乏。以筆者於「《古今圖書集成》研究論著目錄（1911-2006）」所統計約 170 筆左右之數量觀之，此中近半數又係以編纂版本考述議題或電子版推出相關報導評

1998-2005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古今圖書集成》頻率統計表

年份	人文學類	藝術學類	經社及心理學類	引用頻率較低之各類別總和	合計
1998	18	2	2	4	26
1999	16	3	1	3	23
2000	34	3	2	5	44
2001	25	1	2	6	34
2002	45	2	3	2	52
2003	51	7	3	10	71
2004	51	7	5	10	73
2005	61	4	6	6	77
合計	301	29	24	46	400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2005.3，
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2007.3.6上網）。

90 累至目前《集成》已有八種版本問世：1.殿版（1728）、2.美查版（1884-1888）、3.同文版（1890-1894）、4.中華版（1934）、5.文星版（1964）、6.鼎文版（1977）、7.中華巴蜀聯合版（1985）、8.齊魯版（2006）。此外尚有將《集成》某部分單獨抽出印行者，實屬版本分支，詳見詹惠媛，「《古今圖書集成》分部單行書目」，同註2，頁269-272。

91 關於《集成》之電子版資料庫，在臺灣方面約於2002、2003年推出三種：1999-2002故宮、東吳「數位古今圖書集成」、2003聯合百科「標點古今圖書集成」、2003得泓資訊「古今圖書集成全文電子版」。

92 同註39，頁36-37。

93 中國方面所推出電子版資料庫，就筆者所知亦有三種：1998北京超星電子技術公司電子版、1999廣西金海灣電子音像出版社電子版、2004深圳科信源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電子版。

介為主，闡發《集成》學術內涵之深度著實不足，若再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相較則更能映襯其研究風氣寂寥。首先在《四庫全書》方面，在前人研究根基逐漸拓展豐厚下，約於上世紀80年代初已正式形成「四庫學」學科意識，⁹⁴並於1998年首度以「四庫學」為標幟召開兩岸學術研討會，⁹⁵相關專著、專文研究成績蓬勃，今成一門顯學已為不爭事實。而《永樂大典》向以收錄宋元佚書之史料價值為學界珍視，80年代前期已有「大典學」之初步倡議，⁹⁶於2003年亦有國際研討會之舉辦，⁹⁷近2005年更有《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之集結問世，⁹⁸成果數量亦復可觀。據此檢視《集成》本身學術研究之黯淡表現，其在80年代之前主要仍停留在編纂史實考證階段，可謂長時期保持在研究氛圍低迷之狀態，而80年代後因《集成》索引與數位化工作之推動，雖逐漸引起探討利用熱潮，然吾人所需省思者，亦是緣於近來人們對《集成》之認知多將焦點關注於數位化議題，此就古籍實用價值之開發固有其裨益，但相對說來，若過度將探討主力集中於此，則對於《集成》自身學術本質及其永恆文化價值之深入研究言，其長久以來遭學界忽視之情形信將無法獲得進

一步突破，導致熱門議題益顯熱絡，值得深入發掘之研究區塊卻永遠冷僻。實際上，造成《集成》研究質量貧乏並非僅此單一原因，⁹⁹此處亦並非刻意壓低《集成》數位化之成效影響；相反地，將古類書所蘊涵知識材料輔以科技化無遠弗屆之姿帶向大眾，或能成為引領研究風潮之方式之一。¹⁰⁰是以，將《集成》學術內涵普及化並深度化，強調此二者須並行不悖，兩方面之研究發展均不可過度偏執，是項課題亟待學界重新重視並思索改善之，以解決《集成》長期鈍化、凝滯不前之研究落差與困境。

綜上對於《集成》研究成果所做梳理分析，約略可窺其研究型態發展、研究主題面向、研究反映現象，整體而言，前賢時脩於《集成》相關研究專文之論述層面仍未為深刻咸全，簡釋者多，詳闡者寡；考述研究豐，文獻研究賡。筆者鑑於《集成》在圖書文獻學史、類書發展史、清代學術文化史上係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更輔以數位發展，其「普及化」應用價值於學林沾溉甚巨，然而在學術本質內涵之「深度化」研究方面則明顯不足，本文即不揣鄙陋，嘗試於前人研究之闕略處提出部分芻見，望各方博雅君子剴正指教是幸。

94 周積明，〈「四庫學」通論〉，《故宮學術季刊》17.3（2000年春季）：1-2、12。

95 淡江大學中文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96 同註7，頁504-511。

97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永樂大典」編纂600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2003）。

98 張昇編，《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5）。

99 關於《集成》本身研究質量貧乏之因，本文中已提及者包含：1.其成書過程受康雍時期政爭影響，後至民國早期多偏重以編纂史實考證為主，至今仍未稍歇；2.就清朝中後期之文獻學輯佚工作而言，由於《集成》於清初甫編印成、且流傳未廣，故其輯佚價值較《永樂大典》等類書甚少受到學者關注；3.全書知識體系博大，又前作研究主題有限，欲成專論之作實屬不易。而此處第2點所述，另可參考陳惠美，〈《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中的文獻資料及其運用〉，見註41，頁7-9。

100 若就研究發展角度觀之，明初時成書之《永樂大典》，由於三百餘年後《四庫全書》之纂修，方在清乾隆及後世形成輯佚、研究之熱潮；清初成書之《集成》，至今亦約已三百年，或能因現代數位化之推動發展與輔助利用，而於今形成《集成》深化研究之契機。